

CAMBRI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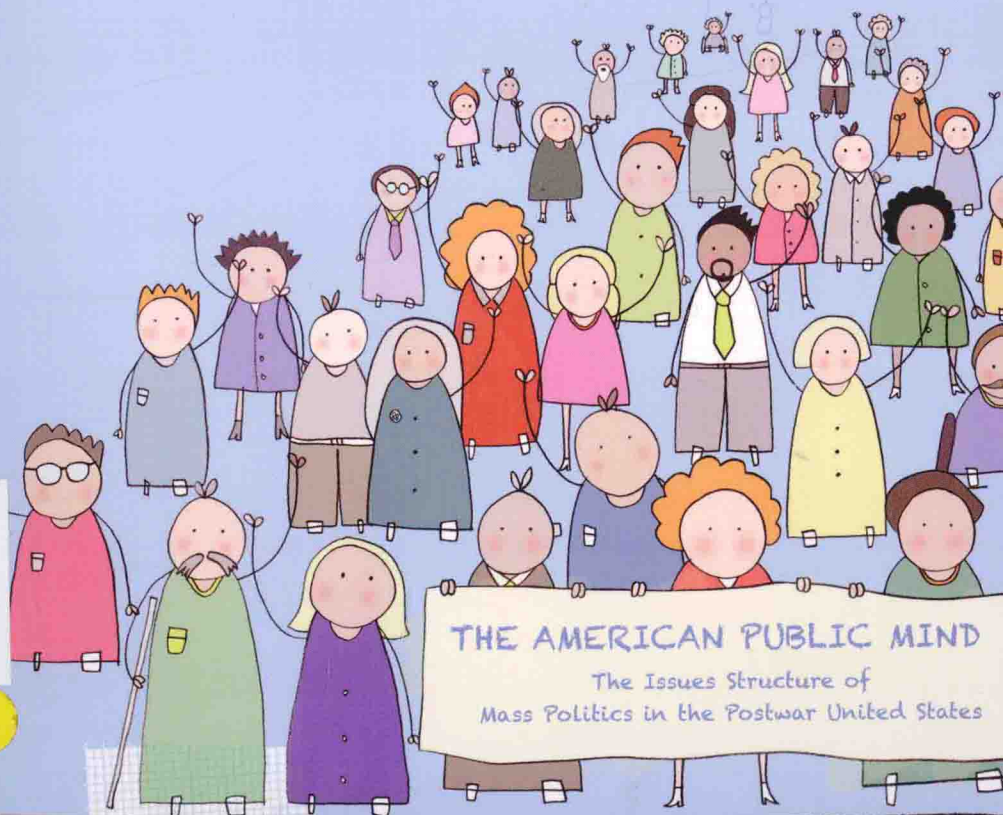
美国民意 (1952~2004)

战后美国民众的政治话题构成

[美] 威廉·J.M. 克拉格特 拜伦·E. 谢弗 / 著

(William J.M. Claggett)

(Byron E. Shafe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政治与公共管理译丛

美国民意

战后美国民众的政治话题构成 (1952~2004)

The American Public Mind

The Issues Structure of Mass Politics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美] 威廉·J.M. 克拉格特 拜伦·E. 谢弗 / 著
(William J. M. Claggett) (Byron E. Shafe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American Public Mind: The Issues Structure of Mass Politics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ISBN 978-0-521-86373-5 Hardback

ISBN 978-0-521-68232-9 Paperback

© William J. M. Claggett and Byron E. Shafer 2010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5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本书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本译出

献给罗伯特·A. 戴伯

他的座右铭是

普通人也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前言

在战后时期，美国政治实质性冲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更确切地说，这种冲突又是怎样反映在美国民意中的？甚至是否有可能与民众而不是与精英阶层来谈论“议题结构”事宜，谈论目前的政策冲突与不断进行的政策调整方面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目前议题结构的冲突又是如何凸显在我们当代的大众政治方面？政策问题是如何在大众政治体系中进行分门别类的？产生的议题结构与选举冲突的关系是怎样的，又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否一直存在于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之中？在这期间，民意数据是随时可以获取的吗？另外，有无主要的突破点？如果有的话，这些突破点会在何时出现？

这些都是本书所要涉及的问题。尽管提供了五十年来有关公众偏好的调查数据，对于议题的研究——改变对于政策的认同，实际上是在公众中塑造了一种政治行为，还只是在起步阶段。在战后时期有许多需要一些公众给予反应的大事件，如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萧条，以及随处可见的社会变化。同样的道理，从这些事件中也产生了很多政策方面的冲突，如社会福利、国际关系、公民权利及文化价值方面的冲突。在周而复始的竞选中，甚至出现了一种常规现象——一种体制手段使公众融入冲突之中，以此记录民众的意愿。

除此以外，本书以比较简单的形式描述了在公众中存在的主要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反映到大众政治中的倾向性，而对于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关键问题，本书则给予了全面而详细的阐述。有些偏颇不足主要还是由其自身原因所致。严谨的学者们认为在领导民众

问题上，民众缺乏稳定的偏好——甚至有时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偏好，因此，目前的政策及政治活动不能有助于竞选。同时，这种现象也反映了相关证据及棘手难题中的一些内在问题。美国国家选举研究，这一研究政治意见的中心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还是缺乏对于政策偏好方面稳定性项目的广泛研究。

这种结果导致了进一步的自我限制。如果潜在的现象存在疑问，又缺乏澄清的事实，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奉劝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将研究的重点从对政治性质的影响转移到对其程序性或表现性方面，同时将研究项目控制在一个短期的范围，达到查出明显的政治因素的目的——政府的政策及公众的偏好？也许可以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在民意中强调政治性质的蓝图已带有固有的不足，以至于不能以任何有效的方式来重新审视？或许这一带有固有不足的蓝图，加上熟悉或棘手的测量困难，已经毫无疑问地使分析者们不用担心对于政策性质和问题冲突的重视？

我们不是这样认为的，本书采取了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经验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加上难于以系统的方式来进行描述，迫使分析者们将其精力转移到别处——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使美国的政治显得更有特质，对短暂的影响更为主观，结构更为非实质性，所组建起来的结构与实际相悖，很少以当前问题冲突和政策偏好为基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关注的是事实，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方法。我们致力于通过了解普通选民对于政策的偏好程度来解释民众心目中的战后政治，同时采用了几个经典的历史背景，如此而已。

为达到本书的目的，以下三项任务至关重要。无可否认，每一项任务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丰富多彩的。然而，如果能将这三项任务完美地阐述，本书就是成功的。毫无疑问，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没有满足以下这三个主要条件，我们来谈论战后美国政治的议题演绎是绝对不可能的：

- 在政策冲突的主要领域里，必须要有持续性的对于公众偏

好的测量，这种测量应该覆盖整个战后时期；

- 在这一时期，必须将这些测量融合在一起，使之伴随每个竞选年而成为包罗万象的议题内容；

- 在每次竞选中，必须将议题内容中的要素与选举行为联系起来。

因此，本书的挑战就是研究一种持续性的结构，标明政策冲突中公众的偏好并使之能够塑造大众的政治行为。研究的第一步非常重要，也可以进行探讨。本书的研究，发展和分析了在四大政策领域中公众偏好的持续性测量，这四大政策领域是：社会福利、国际关系、公民权利和文化价值。本书从战后政治史的文献资料中找到了这些关键领域的理论基础。结合探索性因素分析将这一理论基础应用到1948~2004年的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之中。然后，根据探索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和通过回顾每一政策领域有关公众舆论的专业文献，本书又采用了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整个战后时期的公众偏好进行测量。

这就是我们整个项目的第一个核心成果。而且，这一结果也将有效地为议题结构提供帮助，战后每一次竞选的议题内容，对于整个项目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另外，验证性因素分析实际上既有助于将单一的测量整合为一个综合模式，同时，又能从理论方面理清各主要成分之间的关系。要强调的是这一步骤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举例来说，在研究问题领域时，在投票和公民权利或外交的关系方面，看起来有可能完全不同，因为这些事物本身就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出现的，而是发生在一个包罗万象的议题环境中的。

相应的，通过开发这些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寻找在议题结构中每一次战后选举与投票之间的关系。一旦有这种关系出现，它们的态势、优点及走向本身就是美国政治的基本结构。我们尽量把这些关系作为中心内容来分析。我们也试图梳理出其间的一些主要差别：政策领域中的差别，跨越不同时代的差别，甚至是那些存在于各党派内部的差别。然而，有时会缺乏需要进行解释的关

系。举例来说，在冷战的鼎盛时期或公民权利的革命时期，如果在政策选择和选举行为之间没有关联，又为什么会是那样？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在战后时期美国就议题演化而形成的一种情景。

以前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原因是显而易见，同时也令人生畏。因为理论现象本身就十分复杂，相关的数据又从未按照具有明确目的的方式来进行收集。然而，我们坚信坚实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以本书为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方程的模式，加上新开发的处理缺失数据成熟的方式——为我们的成功提供了可能。如果成功，收获将是巨大的。不只是探讨了战后问题环境的结构，也不仅限于政策领域——如果这一持续性的议题结构确实可以被独立出来的话，同时如果能阐明这一问题与实际的选举行为有关联的话，那么战后选举也能够（至少是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解释。

我们可以采用更为精准的方式来描述同样的事情。美国政治新闻评论员常常把这一主题当成所谓的策略，赛马和喧嚣基本上没有什么主要的议题内容。然而，学术界人士则试图避免这种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结论），通常依赖结构性因素——最常见的是党派关系——用来作为替代物。无论哪种方式，政治学的重要问题和与之抗衡的在理论上表现为选举性的大众政治一起，被推到了边缘地带。我们认为就政策冲突而言，以此作为中心来解析美国政治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们更主张从民众的需求（而不只是从精英的角度）来进行梳理，这就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它以数据为基础，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本书的手稿完成之后并未付梓。十多年前，我们又通过不同的方式开始回到美国政治学的议题结构上来。我们早期基于对这种结构所进行的艰难的探索研究而获得过普遍的好评（谢弗和克拉格特，1995）。如果要找出不足之处，那就是我们有意留下的“漏洞”——在单一时间点上进行的单一性调研。由此我们也开始着手安排，看看我们的调研是否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的做法是

利用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的数据，进行时间跨度较大的调研。

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我们发现我们又找到了重点。从一方面来说，梳理能够被每次美国国家选举研究都认可的目前的结构，这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之高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可以理清的话，而不只是笼统地得出两种简单的归总测量方式，梳理这种结构的结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这些探索——对于我们自己，现在我们也希望对于其他人来说——在理解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以及它的含义时有一些实质性的额外好处——我们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去想从研究中能获得的益处和它所具有的优点、实惠。

不管怎样，我们持之以恒坚守着这份执着，不仅是某种意义上的固执，还因为多年以来发展和建立起来的重要的工作关系。参与其中的最重要人士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J. 梅里尔·尚克斯，印第安纳大学的爱德华·G. “特德”·卡米尼斯，以及 PACES 项目的参与者。梅里尔和特德的部分研究也在用更好的数据，更现代的关注点来探寻我们所尝试过的论点，就像我们也在花一部分精力去探寻他们尝试过的较长时期范畴的研究一样。结果是，几年前，在一段时间内，当我们经常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以及在美国中西部政治科学协会（MPSA）的刊物上同时发表论文时，我们都不断地宣称要发表各自的论文。

在常见的版面中，他们不常受到指责，天普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威尔森和麦吉尔大学的斯图尔特·N. 索罗卡也与我们“心有灵犀”，开展了一个具有相似内容的项目研究，为此，我们深受鼓舞和支持。在书稿后面的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在分析选举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亨利·E. 布雷迪，他是项目主席，他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会议中抽出很多时间帮助理顺出现的一些概念性问题，这给后来的研究学者以重要的启示。

经济资助来源于牛津大学美国政府系的主任安德鲁·W. 麦伦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美国政治学系主任格伦·B. 和克利安·奥尔霍

金斯，这种支持能使我们可以在多个暑期与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工作。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两位研究助理的支持：斯泰西·裴丽卡，她现在任职于威廉和玛丽学院；阿贝尔·威车斯基，她将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研究期间，我们也对她们授以具体解释问题的任务，这样她们在研究项目中就不仅仅担任的是“数据处理者”的角色——我们绝对相信她们在梦中也能描绘出 AMOS 的图形来。

研究项目还得到了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职员帮助。政治科学与历史方面的高级编辑路易斯·贝特曼为本项目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虽然没有做出什么过多的承诺，但是一旦承诺就给予充分的支持。他的帮助使我们免除了出版过程中的一些烦恼。而他又得到了历史和政治学方面的高级编辑助理艾米莉·斯潘格勒的支持，她经常是我们有关实际操作性问题的联系人。海伦·惠勒是本书的制作编辑。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极好的耐心，听取我们关于本书应该如何安排的意见。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本项目确实受到三位人士在精神方面的支持。罗伯特·A. 达尔，不仅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卓越的政治科学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分析实践着他提出来的观点。还有一位是 V. O. 基，他将同样的观点阐述得淋漓尽致；我们借用了他的至理名言作为本书的结尾。还有诺尔曼·罗克韦尔以“四种自由”中的“言论自由”的画面为本书设计了封面和封底（指本书英文版——译者注）。我们要感谢约翰·罗克韦尔以及罗克韦尔家族为我们提供的这样一幅封面画作为封面，我们认为这幅画面能有力地表现本书所想要表达的内容。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公众偏好的结构

数据、理论及本书的组织框架	5
本书的组织框架	12
第一章 现有的议题：社会福利	14
条目的选择	15
探索性分析	23
验证性分析	33
民意中的社会福利	47
第二章 现有的议题：国际关系	51
条目的选择	52
探索性分析	59
验证性分析	75
民意中的国际关系	87

第三章 新出现的议题：公民权利	93
条目的选择	95
探索性分析	99
验证性分析	109
民意中的公民权利	122
第四章 新出现的议题：文化价值	127
条目的选择	128
探索性分析	138
验证性分析	151
民意中的文化价值	164
第五章 混合性条目：真实的、虚假的及含混	
不清的条目	169
表面内容及适当的定位	170
重新审视文化价值	194
民意中的混合性条目	198

第二部分 议题结构产生的一些结果

跨领域的分析	207
选举模型	215
第六章 选举行为：已有的议题	222
总统选举与政策选择的纯政治性	225
社会福利与总统选举	231
国际关系与总统选举	242
现有的议题与投票选举	255

第七章 选举行为：新议题	261
公民权利与总统选举	264
文化价值与总统选举	273
主要的总统独立候选人	283
新议题与选举投票	293
第八章 选举行为：其他内容	299
党派情感、政策偏好及选举行为	301
战后政治的选举时代	322
第九章 大众政治的议题结构	331
美国的民意	332
战后政治中的问题演变	336
战后政治的超短时代	339
负责任的选举？	342
附 录 其他的政策领域？	345
参考文献	352

第一部分

公众偏好的结构

在战后时期，美国政治存在一些美国历史长河中出现过的大的政策冲突，有些冲突凸显在整个战后时期。增加或削减美国福利状况的“战争”，新政的实施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导致的政策延迟实施，以及之后的恢复，直至今日，人们还可以从医疗保险、减税及社会保障的一些新闻标题中体会到政策冲突的存在。同样，关于如何回答外面世界的问题也无处不在。冷战来临，丰富多彩的具有扩展性外交关系的时期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本书所写到的一个仍处于发展阶段的时期的来临。与此同时，美国发现自己不时地陷入与地理战区不同的东亚、中美洲和中东的困境之中。

除了这些大的政策冲突，还有一些事件，虽然在整个阶段这些事件没有主宰政治，但是一旦出现就会非常激烈，事后也没有退去之意。公民权利“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爆发，导致了政策的冲击然后波及了各个机构：国会、政府部门、最高法院及联邦执行委员会。有关种族政策的冲突似乎仍然存在。涉及宗教、性别、成就及秩序的基本的文化价值——社会生活的基础——以不同方式引发了一系列政策问题，即如果缺乏单一的主线，如冷战，那么他们所持有的观点就要通过政治议程上的多样性来体现，就像种族、文化问题总是争论的焦点一样。

同样是在战后时期，没有充分展开阐述的是一些简单而又具有持续性作用的，在政治冲突里得到政策领域概括的公众偏好。某些具有公众影响的内在性的潜在机会，尤其是总统选举，得到了可靠的和有规律的呈现。另外，当调查员询问公众意见时，公众确实能够对于这些事件——显而易见的政策偏好——进行判断。然而，议题有变化，并不依赖这些偏好。偏好得失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也不一定依赖于公众的评论。选举的各种因素使公众的“贡献”模糊不

清，虽然他们并不是有意令分析者“绝望”。

虽然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在政治过程形成中政策的实质与公众偏好之间关系相互作用的抽象性，但是当我们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我们发现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政治思想，以及政治目的，在缺乏社会支持时，通常在缺乏持久的社会联盟的情况下，是短暂的。这一事实导致许多社会科学家看低了政治冲突中政策辩论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联盟没有内在的联系（除了政策偏好即纲领性的考虑之外）使之能够团结和凝聚在一起。在没有统一的政治思想时，社会联盟就会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能够提供政策想法的其他选择。这些都不必有“重要”的偏好，但是它们的存在和其连续性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解释方法并非使梳理政策冲突核心部分的公众偏好的调整与演变的任务更加容易。寻找一个这样的社会是多么的不太可能：在这种社会中，公民缺乏共同的历史经验或稳定的社会位置，大多数民众没有自己的政策偏好；在这种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偏好具有可靠的可塑性；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容易受到固定看法、残留思想的迷惑。通过比较，实质上在临时性的稳定调整中的固定偏好——如果分析者能够发现的话——本身就能组成政治学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们有可能按照常规的方式塑造群众政治行为。如此一来，它们还有可能以期待或抵抗的方式，塑造精英政治行为。

对梳理这种结构固有的复杂性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就是放弃。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数据的可比性及其在一段时间内的分析，的确是相当现实的困难，使相关的怀疑部分和不确定的结论得到证实——也许不存在以民意来为复杂的政治画面增添实质性意义的线索——许多研究民意的学者将重点转到它的缺点方面，同时开始研究它的操控性方面（特别是对康弗斯 1964 年和扎勒 1992 年的研究表示敬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用尽了调查和数据的世界里，学者们曾经设想到了这一论点的范畴，以及其间的关联，更为概括性地来理解政治学的结构（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杜鲁门在

1951 年和基在 1961 年的研究)。那些自认为追随这一传统的学者们继续考虑有难度的任务以证实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是民主理论的中心,是实用政治学的关键。

一方面,没有自我意识的民主人士可能认为没有“民意”;另一方面,最笃定的分析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将其梳理清楚所面临的内在困难。幸运的是,鼓励这种替代的想法出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之中而被总结到了《问题演变》一书里(卡米尼斯与斯廷森,1986;费尔德曼,1988;卡米尼斯与斯廷森,1989;谢弗与克拉格特,1995;莱曼与卡西,1998;莱曼,2001;尚克斯与斯特兰德,2002;尚克斯、斯特兰德、卡米尼斯和布雷迪,2005,以及卡米尼斯与瓦格纳,2006)。并非所有这些研究都分享我们所特别的关注点。不是所有的进程都以,甚至是大致以平行的方式进行。然而在其范围内,政治辩论的中心内容确实出现了,并且是以将政治实质与公众偏好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进行演变的,这种变化仍然有很大的不同。

- 有时民众持续关注一个政策问题,使之进入国家大事的议程,该问题的主要替代反馈到(并形成)该民众所属的社会联盟之中。这也许是民主理论的经典观点。

- 有时,不是政治精英,大多数时候是党派精英,一些兴趣团体的精英,有时是媒体精英,提出问题并使之进入政策议程。然后民众做出反应,再以同样的方式促进或瓦解持久的社会联盟。

- 有时,也许更经常,在民众和精英控制之外的主要事件产生的政策问题需要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反应。这种反应的性质受到以下条件的影响:是否在相关领域里有现存的公众偏好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是如何应用的。

始终没有一个能动的主体能控制所有其他的主体,这就使确定公众偏好在政治选举中的位置有一些实际困难。然而,复杂性不应该推定为不一致性,或无关联性。所有这些意味着解决美国政治冲突实质的挑战确实是无处不在的,因为,它的确在整个战后时期影